

世界華文文學的「區域」思考 / 李瑞騰

世界是一個空間概念，指的是整個人類所居住的地球，所以也稱全球，具體來說是七大洲、五大洋；華文是一種語文，即華人所使用者，另外也稱為中文、漢字等；文學以文字作為表現媒介，組織而成篇章，有其形式之整體美以及內涵意義等。當這三個詞彙組合在一起，意義很清楚，指的是世界各地用華文所寫成的文學。

我們講各地，可以從自己立足之地的外部區域概念來說明：我立足台灣，往外首先是台澎金馬，然後是兩岸三地，再擴大看去便是東亞、亞洲、亞太地區，最後是全世界。

台澎金馬是台海兩岸分裂分治所形成的區域空間，澎、金、馬三島有其特定的史地條件，但常被台灣統攝，現在已經出現金門文學如何納入台灣文學的討論。而兩岸之間，自有其複雜的關係史，加上曾經作為殖民地的港澳，因此而有兩岸三地的說法，以三地（台、港、澳）和中國大陸本土的「去／就」關係來說，文學關係史錯綜複雜，可能要有浮動史觀，清領時期和日據時期兩岸文學的相對關係是不一樣的；20世紀冷戰時期台港文學關係，如今已不斷被挖掘探討，而且已擴及星馬。

被包括在東亞內的區域，除兩岸三地，另有蒙古國和日本、韓國，對台灣來說，蒙古太遠，日韓曾經屬於漢字文化圈，漢文學發達，惟現代華文不成文壇，只零星個別作家；不過，日本從晚清以降影響亞洲甚巨，文學方面自不例外。

至於亞洲太平洋地區，顯然還得加上東南亞（和南洋群島），有幾個國家的華文文學頗有傳統，中南半島的越南、泰國，南洋群島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汶萊、菲律賓，近年則有印尼和緬甸等，在華文解禁以後快速發展中。此外，南大洋洲的澳大利亞、南太平洋的紐西蘭，近歲以來華人移民劇增，華文寫作人口亦多，澳大利亞甚至已有兩個華文文學團體。

再來就是美國、加拿大及歐洲的德、法等國了，所謂的西方世界，先進國家，華人從留學到移民，以華文寫作的大部分是知識精英。

一個華文文學區域的形成，是看那裡有些什麼人在寫作？作品流通狀況如何？作家群是否組織化？其屬性及運作形態如何？我們也看它納入更大區域的情況，看它與他域的關係，看它內部是否自足？看它的支援系統如何（政治、經濟、社會、學術）？看它過去的人文傳統如何？看它相對於過去所形成的時代文體如何？等等。

隨著華文普及，世界華文文學將獲得更多的關注。近歲以來，或倡言「漢語新文學」，或以「華語語系文學」為名展開新的論述，名稱是重要，但似乎很難定於一，就展開實質討論吧，特別是學科化極其重要，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有能力把這件事做好。

台灣及其週邊

台灣往外的橫向聯繫，西邊隔著台灣海峽，有一個龐大的大陸。台灣在福建閩江的外海，跟大陸的關係到底是怎樣？這是我們的宿命，我們沒有辦法不去面對的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當我們往北邊看，順著中國大陸的沿岸往上，會遇上兩塊土地，一個是日本、一個是韓國，那台灣與它們又到底是什麼關係？日本殖民台灣、澎湖，也殖民韓國，台灣跟韓國的歷史處境其實是非常接近的。

在日據時代，台灣有一些文人，當他想到唐山，譬如當鍾理和決定帶平妹私奔的時候，他首先想到要去的地方是哪裡？東北，遼東半島，為什麼？主要可能還是受到了日本的影響。日本穿過了朝鮮半島，進入了中國東北那麼一大塊土地。各位知道，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台灣割讓給了日本，日本人除了台灣、澎湖，還想要的地方是哪裡？就是遼東半島。後來三國干涉還遼，日本最後沒有要到，但日本的勢力遍佈東北，民國建立以後，日本還扶持了一個偽政權，溥儀的滿州國。

往東呢？隔一個廣大的太平洋，再過去就是影響台灣非常重大的美國了。各位想想，1949年以後美國影響台灣有多大？不要說台灣，就算是對中國的影響也很大。美國是20世紀的超級強權，但是美國人的政治思維跟東方人基本上是不太一樣的。當中國發生內戰，美國人期待中國能形成跟他們一樣的兩黨輪流執政的局面。想一想，美國介入韓戰、越戰，最後呢？中國隔著台灣海峽變成兩岸，韓國呢？38度線分隔成了南北韓。越南不是也變成南北越嗎？美國介入遠東或者叫做亞太地區之後，所形成後來的局面，潛因素都是文化。

再說往南，隔了一個南中國海，就是中南半島和南洋群島，亦即東南亞，距離台灣其實相當近。

台灣之南

多少年來，在台灣文學領域，我花很大的力氣去進行各種資料的收集，因緣際會進入了台灣之南的東南亞。我參加過許多有關東南亞的文學會議，記得有一個朋友講過一句話說：「在台灣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主要還是來自於東南亞的學者」，這是理所當然。我們知道像黃錦樹、陳大為，還有李有成、張錦忠、林建國，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從東南亞來到台灣讀書，讀完了以後就留在台灣，然後進入了台灣的高校教書，在做研究的過程當中，除了與台灣有關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回頭去研究僑居地或者原生國家。而我則是因緣際會踏入了這個領域，今天我就順著自己的因緣來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對東南亞的印象。因為我們所談的台灣新住民，主要還是從東南亞來的。這些新住民，我們通常是從女性的角度來討論，不管她來自於哪裡，來到台灣以後，等於就是進入了我們的內部，如果我們能夠對她們所來自的地方有多一點了解的話，可能更能夠了解她們的習慣，還有文化表現。

在台灣，每次颱風來的時候，常常先到菲律賓，再到台灣。菲律賓距離台灣非常近。在國際關係上，菲律賓政府沒有承認台灣是一個政體，也沒有正常的外交關係，前不久一個很大的新聞，台灣的漁船船長被菲律賓人槍殺的事件，菲律賓派了代表到台灣來，雙方無法對等的碰面與談話，主要是因為沒有一個正式的外交關係。各位要知道，台灣跟菲律賓之間，在1949年之後並不是一下子就跟今天一樣，我曾經清查過菲律賓在戰爭時期的情況。菲律賓，我們可以這樣講，整個東南亞，1940年代初幾乎都淪陷了。日本人在整個東南亞留下了摧殘的遺跡，馬尼拉有，婆羅洲也一樣。

有一個朋友到古晉去拍記錄片，就是要找集中營。關於集中營，我最近看了一些當地一些女性口述在日本佔領時期的狀況，常常提到台灣兵，好像當時女性只要一碰到態度比較好的，談幾句就說對方是台灣兵。在口述歷史裡面，能夠看到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台灣是在日本統治底下，整個東南亞也幾乎都是如此。舉個例子來說，在砂拉越的拉讓江，中砂往南，有個叫詩巫的地方，被日本統治了三年多的時間，有一個老前輩，就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詩巫劫後追憶》，來紀錄被日本人佔領的時代情況；現在又有很多女性把她們的經驗都講出來，記錄片的內容也越來越多了。

1949年以後，兩岸分裂，中共鎖國，一開始只跟北方的蘇聯維持關係，被稱為「鐵幕」。東南亞華人的認同轉向在台灣中華民國，台灣為了要安頓很多從大陸來的文藝作家，在1950年成立了「中國文藝協會」。沒有多久，菲律賓華人就成立了一個「菲律賓華僑文藝工作者聯合會」，跟台灣的文協同步發展。從台灣去菲律賓講學而影響當地文學發展的人，包括了覃子豪、余光中、王藍等人。因為沒有高等教育，華人教育最高只到中正學院，像台灣早期專科學校的程度，所以菲律賓特別需要這樣的講學。而菲律賓政府對於華人的態度，我們可以這樣講，東南亞大部份的國家都曾經排華過。馬可仕統治菲律賓很長一段時間，也曾經長期戒嚴，但馬可仕對華人的態度其實還不錯，不過卻出現過華人不願意入籍現象，主要原因是受到華人對自我身份認同的影響，永遠認為比菲律賓人還要文明。移民時間久了以後，有一些人入籍，但有一些人沒有，之間就開始出現矛盾；有一些人跟在地菲律賓的女性談戀愛、結婚，有了新的後代。

婆羅洲島，是全世界數一數二大的島嶼，這個地方分別屬於三個國家：馬來西亞、汶萊和印尼。馬來西亞部分是東馬——東馬來西亞。東馬來西亞和從中南半島的泰國南邊連接下來的馬來半島（西馬），隔著一個南中國海，從西馬要到東馬，觀光遊玩是沒有問題，但為了要保護這個地方，州政府規定很多、條件非常嚴格，所以雖然是同一個國家，但要進去等於是出境再入境。東馬又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北邊，原來叫做北婆羅洲的沙巴。旁邊有一個石油王國——汶萊，下面就是砂拉越。沙巴跟砂拉越是東馬來西亞的兩個州，汶萊是一個獨立的王國。東邊跟南邊這麼一大塊是加里曼丹，華人也不少，屬於印度尼西亞。

今天台灣所稱的新住民，很少來自於馬來西亞；來自馬來西亞的新住民都是高級知識分子，都是大學的教授。在東南亞，我比較熟悉的還是馬來西亞，花比較多的時間。菲律賓，也還算熟悉。

另外就是中南半島，中南半島在過去長期都跟中國有很多互動，在歷史任何一個時期都可以看到來自於中國南方的相關訊息。譬如說三國時代講到諸葛亮七擒孟獲等等，其實都是在這個地方。我因為沒有力氣去做太多的探索，所以對這個地方的了解還是比較簡單。泰國有一點點了解，越南也是，越南的漢文學在還沒有被法國統治之前，算是比較有發展的。台灣曾經出版過一套《越南漢文小說大系》，後來的越南當然改變很大，現在好像非常資本主義。

我沒有去過印尼，可是最近幾年因為有一些印尼學生來台以後，必須去指導他們，所以也跟他們一起學習了不少東西。

我先把東南亞的情況讓大家有一點了解。台灣的三民書局有一套書，包括菲律賓、印尼都有國家的歷史。台灣早期正中書局也出版了許多這樣的書籍，更早的僑委會出版的更多，現在都找不到了。以下我想跟各位簡單的談一下我自己的經驗，對於各位是否有幫助我也不清楚。

李永平的《拉子婦》

我最早接觸到東南亞相關的書籍，就是李永平的《拉子婦》，但當時讀的時候，深深著迷於裡面的異域色彩，並沒有意識到作者的馬來西亞背景，因為這本書是在台灣發表、出版的，對於它跟台灣之間的關係，我沒有形成比較深刻的想法，還是認為它是台灣的作品。那是一本小說集，其中觸及漢人（唐人，或者華人）和當地的原住民——拉子的種族衝突。

李永平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小說家，在古晉中華中學讀書時就開始寫作，出版過中篇小說《婆羅洲之子》；來台灣唸台大外文系以後持續寫作，有一篇作品非常重要叫〈拉子婦〉。「拉子」是福建話，指稱當地原住民，帶有點歧視性的語言。〈拉子婦〉講述一個從唐山來的華人家族，兒子因為在山裡面做生意，跟一個當地的拉子女人結婚，這個事情在家族裡面引起一場很大的風暴，從華人的角度來說，這是一位不孝子孫。這個作品裡面表達了非常嚴重的種族歧視，但仍然出現年輕一代要求平等、尊重生命的聲音。

整個東南亞，這種種族的問題在每個地方都發生，今天你看不起他，有一天就會出現問題。在李永平的小說裡面，就出現過整個拉子圍城的狀態，他寫〈圍城的母親〉，把母親的偉大，怎樣用自己柔軟的力量，護衛自己子女的那個情況寫出來。書中衝突不斷。

這相當程度讓我們有所警惕，我們必須站在一個種族平等的立場上去相互對待，就好像現在在台灣對待原住民，跟過去長期以來的方式，是不一樣的，這是我們必須要體會的，歷史提供給我們很多例子，當然有些時候做起來很不容易，但一定要努力。

族群、語言與文化包容

新加坡的情況不太一樣，因為李光耀治理的新加坡，華人那麼多，大概佔七成，但是他對於華語、華文態度謹慎，充份反映出他做為一個政治家的高度。華人在新加坡佔了七成的人口，他們的語言——華語——好像理所當然會成為新加坡的國語？但是新加坡並沒有只選擇華語，馬來文是國語，華語也是國語，英文更是一個主要的共通語。語言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它的背後代表的就是族群，歷史上因為語言問題而產生的族群衝突非常多，所以任何一個政府都必須要用智慧去面對並處理好語言問題。

從這個角度來看，不管是漢人移民台灣，日本人來到台灣，或者戰後國民政府接收了台灣，政權在移轉的過程當中，我們所看到的情況，包括1949年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在語言的政策上，基本上都可被認為是失敗的。如果在1945年日本人離開的時候，政府有今天的智慧，能夠有同情的諒解，以及文化的高度，那就不可能會發生二二八事件，不可能在光復一週年，就宣布所有日文都廢止使用，而是應該有更大的胸襟去涵攝，畢竟有那麼多人懂得使用一種特定的語文。

「怎樣讓他們多學一種語文？」這個想法在現代絕對是關於競爭力的考量，但當時卻那麼快速的要去清除日本的遺毒，動作與速度又那麼粗暴。日據時代已經習慣用日文寫作、用日文溝通的人，到了戰後一週年日文被廢止時，他就閉嘴了，就沒有辦法再使用日文，出現了一種奇特的「潛寫作」的現象。為什麼要潛寫作？因為寫完了以後不能公開發表，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就是潛在寫作的例子。現在回過頭去想這個現象，當年國民政府接收了台灣，當然需要去推行國語，但是推行時一定要把日語毀滅掉？把母語都壓抑嗎？不盡然需要這個樣子，這是一個關於是否擁有前瞻性眼光的問題。當年很多太急躁的、太粗暴的作法，後來都嘗到了苦果。

為什麼我喜歡讀東南亞華文文學作品？因為可以讓我有更大的包容力，譬如只要從台灣這個地方產生出來的東西，都是我們共有的資產，不能說只有我自己的東西才是最好的，唯我主義、我族中心主義，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別人看不起你、不喜歡你，整個生活的空間就會出現很多的問題。我從李永平的《拉

子婦》裡面，大體上來說感受到了這樣一些族群之間的問題。另外更重要的是，「投荒」過程的辛苦。目前還有很多人還在寫這樣的東西，離開了自己原本生存的地方，到了他鄉異縣，有些在自己國境之內還好，有的還到了國境之外，甚至遙遠到只要一出事，任何奧援都沒有的情況，這種飄零的過程非常辛苦。多少年來，在文學或文化裡面，有一個不斷被使用的概念，就是「離散」（或者「飄離」）。離散，就是人們主動或被動的離開自己的故土、生活的空間，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備嘗艱辛的情況，在過程中，又沒有辦法融入到對方的社會之中。我在1980年代跟一個菲華友人不斷往來的過程中，接觸到了一些還拿著中華民國護照的老前輩，他們就是不願意融入當地，結果就是他活的非常不愉快，因為他看什麼東西都不順眼。生活在那個地方，它本來就是一個國家，假設政府排除你，那也就算了，它容納你的時候，你又不進去，自己就要忍受，這種情況非常令人扼腕。

現代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當然情況就不一樣，往後在台灣這種事情可能也會不斷的上演。今天新住民是移民的第一代，那第二代、第三代，又會是如何？1960年代到美國讀書的那些人，最後有一些人回國，有一些人沒有回來，沒有回來的生下了第二代，第二代不會講中文至少還會講母語，到了第三代名字都變成了湯姆(Tom)和瑪莉(Mary)了，所以現在要以大的歷史視野來看未來才行。現在台灣的新住民，主要還是因為婚姻關係而移居台灣，她們的下一代佔了台灣新一代人口組成的很大部份。最近有個新聞還滿令人興奮的，今年的十大傑出青年裡面，有一位是新住民，等於說他真正的、良好的融入了這個社會。

在做馬來西亞華人研究時，比較多的是在研究華文文學發展，像是探討一些年輕人來台灣讀書以後，怎樣去走文學的這條道路等等，但我們有沒有想到，台灣也有人去馬來西亞？那裡也有一些台灣媳婦，我就曾經邀請了一位非常有名的馬華作家永樂多斯來到這個地方，跟我們談她嫁到馬來西亞去以後，面臨的總總困難和挑戰。她是新疆維吾爾族人，她的父親從新疆來到了台灣，在政壇上也曾經叱吒風雲，現在當然年紀大了。永樂多斯是在台灣出生、長大的新疆女孩，她一定認為她自己是台灣人也是新疆人，最後她決定嫁到馬來西亞去。聽她講述那樣的過程，在馬來西亞連洗澡都不知道該怎麼洗，沒有浴室、要露天沖澡，簡直不能想像，但是還是要面對它，才能度過。最近有一個年輕的朋友跟我說他很想來探討一個問題，從台灣嫁到馬來西亞去的人，她怎樣去適應？怎樣去度過那個漫長的歲月，終於才能夠在那個環境底下可以跟很多人一樣的去競爭、一樣被平等的相互對待？《拉子婦》給我很多的感觸，那個時候年輕，讀完了以後有所感，便寫了一篇文章來談《拉子婦》¹，這是我最早寫的一篇對馬華文學的探討性的文章。

《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

人生的因緣，有些時候很難講，我毫無東南亞的背景，但卻慢慢踏入這個領域。大約是1982年，時報公司出版了一套《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是由柏楊主編的。當時，他從綠島回台北以後，因為這個受難的經驗，他答應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邀約，也因此在新加坡就造成一陣旋風，想替新加坡做點事，回來以後就說服時報出版公司出版這套書。這套書總共有五本，我那個時候才30歲，人生如果有所謂事業的話，那時便正是在起頭的階段，通過比較生澀的學生歲月，進入到社會的層面，然後開始要硬碰硬的在職場上跟別人競爭的狀態，也因此做很多事情都非常的積極，這個積極性我到今天我都沒有改變。柏楊邀我幫他忙，所以這個五本書，有四本是我編的。我為每一本都寫了很長的導論，包括詩歌卷、雜文卷、散文卷和史料卷。為了要編這一套書，我大量的閱讀東南亞相關資料，正中書局曾經出版過一些東南亞的書，早期僑委會也出版了很多，像是越南、馬來西亞志，這種方志型的書，我到舊書攤

¹即〈重讀《拉子婦》〉一文。

去收集。因為完全陌生，如果沒有比較多的史地背景，要去看這些用華文寫的，在當地的報刊所發表的一些文字文本，還是非常的辛苦的，所以就大量閱讀，對我來說，等於是做了未來長期要走這條道路的準備工作。其實那個時候我還沒有產生這念頭，只是替柏楊做一件事情而已。

這套書對我來說很重要，特別是柏楊給我一個重要的觀念，他說我們不能用「僑」的觀念去看待他們，今天很多人都還說他們是華僑，但是他們是新加坡的國民、公民！這個觀念我建立的比較早，所以我不會以一個宗主國的角度去看他們，這很重要，這樣才能夠平等相對待。從書裡，我讀到那麼多的人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面臨了環境的挑戰，還把這些寫成了那麼多的文學作品，我們因此能夠看到很多不同的社會。在城裡跟在鄉村，在西馬跟在東馬，都差得很多，到今天，西馬的作家還不太了解東馬，他們都還覺得很奇怪，我怎麼會跑到砂拉越去。

關於新加坡的華文文學，有個問題當年也困擾著我。新加坡現在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是它原來是受英國統治，在戰後民族自決的觀念普遍的興起，隨後形成了獨立的潮流，當時馬來西亞曾經提出「馬來西亞計畫」，主要就是為了組成「大馬」，所以新加坡就是成為大馬的聯邦，但三、四年之間，就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了，時間相當短暫。所以當談到新加坡的文學時，在之前它不成為一個國家，是一個被殖民的城市，曾經有一段時間是共同屬於馬來西亞，之後它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所以在處理的時候就面臨了很多問題，而且新加坡的很多作家，即便在新加坡獨立之後，還參與了馬來西亞的文學活動，因為兩者的距離很近。我有一個好友在馬來西亞柔佛州的南方學院大學教書，從新加坡開車一個多小時就到了任教的學校，只是要出關跟進關比較麻煩而已。我編這套書得到最大的收穫就是，閱讀很多有關東南亞的歷史跟地理的資料，讓我對東南亞有比較多的了解。書裡面常會提到在中國歷史上，它們之間的關係到底是怎樣？而現在的情況又是如何？

《文訊》菲律賓華文文學特輯

我在1983年左右開始主編報紙副刊，也一邊在學校教書，次年也接了《文訊》這個雜誌。《文訊》目前是觀察華人文學非常重要的刊物，當年是25開的版型，現在是16開的。第24期的封面是吳三連先生，這一期有「菲律賓華文文學特輯」²，等於是一本關於菲律賓華文文學的專書。

進《文訊》之前，我在編副刊的過程中，收到許多海外寄來的稿件，那些寫作者一旦來到台灣時，都跟我碰面。最先是菲律賓，有一些菲律賓華人在台灣工作生活，有一些在銀行界，有一些甚至於在台北開店，我因為這個機緣而很快的認識了他們，也為了要了解菲律賓華文文學的特質，特別安排到菲律賓一趟。這趟旅行對我影響很大，我幾乎見了該見的人，同時在當地開了一場座談會，記錄就登在這期的《文訊》上，我因此更了解到在華人社會裡左右對立的嚴重性。那時候，台灣早已經跟菲律賓斷交了，左派作家跟中共大使館以及左派的報紙之間關係密切，要跟這群人接觸有基本的困難，必須要經由更純粹的文學人或是更純粹的學術立場才可能。親自到場去接觸這些作家的經驗，對我往後的論文寫作有相當的影響。

我已寫了一些有關菲律賓的討論性文章，這些文章其實都有一些看法，我希望他們能夠走出華人圈，沒有走出來，就很難用族群對等的角度來看待他族，因為當你以某個角度看待別人，別人當然也會這樣的來看待你。

現在在其他地方其實也有一些人努力在做，譬如在馬來西亞翻譯以馬來文寫作的文學作品，在過去這樣的作品是沒有華人願意看的，現在已經有一些人開始做馬來文文學及華文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有

² 《文訊》，第24期，(1986)：57-216。

人會去把馬來文作品翻譯成為華文，並且在華文的出版社出版。文人通過他的作品，還有他所能掌握的媒體，會影響周邊很多人，這樣的東西做的越多，族群間的緊張性慢慢還是會減低的。

我在研究及閱讀相關文字文本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些永遠不變的書寫主題：一是他們的祖先從中國大陸到南洋的過程，另外一個是到了南洋以後的跟當地文化的互動與衝突。更複雜的就像是男女之間的問題，譬如女性的地位。在台灣，女性的地位都已經開展到相當開明的地步，但在海外華人社團體裡面，保守性還是存在的。女性要有自己獨立的能力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社會條件不給她們去實現。有一個跟我同年的好友商晚筠，十幾年前過世了，在我看來她是馬來西亞最了不起的小說家，她來台大唸外文系，在台灣出了兩本小說集，後來生活的很不痛快，很不幸英年早逝。我在她的作品裡面，特別強烈的感受到女性的邊緣性。女性有理想、有抱負、有想要往外發展的衝動，但沒有相應的環境，這之間就形成很大的衝突。

我們來看台灣很重要的小說家廖輝英，她在1980年代寫的《油麻菜籽》，就可以看到，在那個年代或更早，社會開始要求男女平權，她透過文字文本有意提倡，壓抑男性，但那是為了提倡男女平權。雖然她用文學去壓抑男性，但在現實當中，她還是要負起照顧一家人的責任。台灣在這個部份的發展畢竟還是不太一樣，跟西方先進國家沒得比，但至少是朝一個比較理想的情況去發展，海外的華人社會在這方面的發展更不好。

從這些作品裡面，我們也可以看到華人以怎樣的眼睛去看待異族，比如商晚筠的小說裡面出現了一些印度商店，去看她如何描述這些印度的小商店，透過書裡年紀還很小的角色，去看待這些印度人。我們今天都知道印度有很多非常優秀的年輕人，高科技發展得不錯，而小說裡的印度人卻不是那樣，值得我們去深入了解。

東南亞華文文學研討會

我雖然已有一些相關經驗的累積，但接觸來自世界各地對於東南亞華文有認識的學者們，則是從1988年在新加坡的東南亞華文文學研討會上開始的。我自己在會議上寫了一篇論文討論王潤華先生的作品，他出生在馬來西亞，然後到台灣政大讀西語系，到美國去讀碩、博士，之後去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書，從那裡退休後，來到台灣在元智大學當了好幾年的教授，現在又回到馬來西亞，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世界性的學者跟作家。這個研討會對我來說意義非常重大，這個會場也很特別，它是新加坡華文作家協會跟德國的歌德學院一起合辦的，所以在這個會議上，甚至於有來自於德國、美國、中國，很多對東南亞文學有接觸、有興趣的、有研究的人，有好幾天的時間，住在同一間旅館，安排了很多可以互相討論的機會。在這個會議中，我認識了很多，往後我對於東南亞的相關研究，基本上是從此時開始，當然如果沒有先前的那些累積，也不可能會有往後這些開展。當時認識的朋友，到了今天，很多還維持密切的關係。

1988年的研討會是在新加坡舉辦，從吉隆坡來了很多人。有一年去新加坡，便決定去一趟吉隆坡，朋友在那裡替我做了相關的安排，而且住在朋友的家裡，所以更貼近他們，而不是像旅客一樣。整個90年代，我常到東南亞去，每次去都是發表論文，或是去演講，巡迴馬來西亞，在西馬走一趟，很多人都問我去過哪裡，我連吉打的雙溪大年都去過了。

泰國華文文學

我太太在聯合報工作，曾經負責過泰國曼谷世界日報的副刊編輯，那是聯合報的關係企業，到現在都是。當年趙一明先生在那裡擔任社長，去了一趟，由他來安排。泰國華文界的情況，跟菲律賓跟馬來西亞都不一樣。泰國的作家絕大部份都是做生意的，那裡沒有知識份子的活動空間，少數的幾個報紙，像世界日報的稿件很多是從台灣去的。沒有很多的活動空間，就無法形成公共知識份子的社群。那裡用華文寫作的空間也不大，雖然有報紙副刊可以發表作品，但因為作家都忙於生計，寫作的動能無法達到像新加坡或馬來西亞那樣，菲律賓的情況也大約相近，因為沒有高等教育，華文文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困難度。在台灣，台灣文學目前的情況，以學術性來論算是蓬勃發展，高校裡面到處都是台灣文學系所，成立多，投入的人力也多。台灣文學館有一個「台灣文學研究人力」的資料庫，因為很多人投入了台灣文學的研究，學術的力量支撐了這個文壇。這樣的情況在泰國是看不到的，在菲律賓也看不到。但是在馬來西亞，這個力量還是有的，很多大學裡面都有中文系，學術力量足以支撐這樣的文學發展。

砂拉越的追尋

1999年，我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開會。馬來西亞的留台生有一個聯合總會，那個時候的總會長鄭玉輝先生是我的朋友，希望我利用去吉隆坡開會的時間去一趟砂拉越，邀請我去一個叫詩巫的地方。我去了兩天，當地朋友送的書，大概有50本之多，都是華文書。演講完很倉促，所以也不大有時間去翻看，書扛回來之後就放著，直到有一年想到那些書應該翻翻看一看，才發現那些值得探討，後來就申請國科會的計畫，開始進入一個特殊環境，去了解過去我完全不知道的一個社會。期間，我去了幾趟，有一次還巡迴整個砂拉越。

砂拉越的北邊是沙巴，有個K.K.機場(亞庇機場)，從那裡轉到砂拉越，前後換了九趟飛機，去了在汶萊旁邊一個叫做美里(Miri)的地方，附近有一座國家公園叫穆魯(Mulu)山，要搭十幾人座的小飛機上山，很緊張。我後來收集一些砂華作家寫穆魯山的作品，也知道這個國家公園非常漂亮。

詩巫(Sibu)在拉讓江下游和它的支流伊幹江交會的地帶，來這裡開墾的是一個晚清福州的舉人，參加過康梁變法。我的博士論文研究晚清文學思想，所以當我知道是黃乃裳先生帶著福州的同鄉，一批又一批的南來墾拓，我深感興趣，就一路追，很多有關的地方我都去過了，包括黃乃裳路、黃乃裳紀念公園、黃乃裳中學等等，有一次到福州還想去看黃乃裳的紀念館。台灣人比較不會到那邊去旅行。拉讓江變得比較像黃河了，因為山上濫墾、濫伐，整個河流都變成了黃水，非常遺憾。這個城市裡面，天空都是燕子在飛，我常常想念那個地方。那裡的朋友有時還會打電話來，問我什麼時候去，我很想去。

結語

最近幾年到台南來，減少接研究生，但從印尼來的，我常常覺得他們來台灣唸書好辛苦，還是接了幾個，讓我對印尼有了新的看法。最近幾年印尼確實改變很多，長期對華文報刊的管制放鬆了以後，在地的華人社團、華文報也開始出現。此外，這幾年也是因為學生的關係，才得知緬甸的華青在網路上組成社團，要出版詩集，要我替他們寫序，我看了他們的作品，給他們一些意見。

類似這樣的情況，希望以後還是有機會可以參與，因為我有一個基本的信念，不管什麼地方，只要有人在那裡從事寫作，那個地方就有充份的理由讓人去對它進行了解，因為通過文字文本，背後就是那個社會與環境。所以我很希望有那樣的機會。

我另外有一篇小文，供大家做參考，表示我們不只在台灣做台灣文學，同時也把視野放大到很多華人所在的地方。我對東南亞有些了解，但在加拿大、澳洲、美國等等，都有很多作家在寫作，世界性的華文文學，這個觀念必須建立起來。最新的說法，叫做「華語語系文學」，包括在美國的王德威教授、史書美教授等，都極力在推動。我希望通過文學，看到我們所要了解的各種東西。

南方的誘惑

——我在東南亞華文文學領域的探索 ◎李瑞騰

一、前言

所謂「東南亞」係指亞洲東南部地區，包括中南半島和馬來群島。在半島上的國家有越南、寮國、柬埔寨、緬甸、泰國、西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群島上則有東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汶萊和東帝汶（西馬和新加坡這個島的北邊與泰國接壤，可以屬於半島，但就其位置來說，當屬群島），總計是十一個國家，鑲嵌在海洋中，有如一面破碎的鏡子，陸地總面積達四百四十九萬平方公里。中國古代泛稱之為「南洋」，介乎印度和中國兩大文明古國之間，種族多元，文化複雜。

由於特定的史地條件，東南亞的部分地區有著相當程度的華族色彩，華人和華文普遍存在，由於華團、華教和華報等三重因素的影響，因此產生了華文文學，在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菲律賓、印尼、泰國等地都已經形成各自的傳統。

大體來說，我們一般都只談現代華文文學，因為在中國的五四運動之前，在東南亞所出現的漢語文學，除了和中國接壤且歷史關係複雜的越南以外，作品的量有限，一般被視為是中國的域外文學。但隨著二十世紀近代國家的形成，對於東南亞華人來說，在地化產生了國家認同上的轉向，僑民與本國公民之間逐漸拉扯調整的結果，在文學上終於也有了在地意識，特別是在五四新文學的影響下，東南亞的華文新文學吸收了寫實的思維，在地色彩更明確，於是東南亞的華文新文學也國別化了，馬華、菲華、越華等概念日漸形成。不過，現代的舊體詩也還是有的，不能忽略。

最近幾年，海峽兩岸出現不同的「海外」及「世界」華文文學的概念，再加上對於「中國文學」、「台灣文學」的界定產生歧異，有關「華文」文學的討論莫衷一是。

二、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形成與特色

語文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各種文化類型和經驗的敘說皆有賴語文的運用，當「華文」（特指現代白話文）作為文學最基本的書寫媒介，其所承載的必然與華族文化息息相關，特別是承自中華傳統的生活文化。從這一點來看，東南亞華文文學和其他地區甚至中國大陸、台灣的文學其實也沒什麼兩樣。

但影響文學寫作最大的是環境，而環境有大有小，大環境指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小環境指作家的家、鄉及成長過程中的諸多活動場域。對於一個國家內部某個特定種族、個別語種之文學的整體而言，執政者的種族、語言及文化政策之影響非常重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該種族該語種的在地處境形塑其文學傳統。從這裡來看東南亞各國的華文文學，應該可以看出同中之異。

首先我們注意到華人之往東南亞遷移的歷史事實，漂洋過海、異地墾拓的艱辛與乎原鄉的牽扯所萌生的繫念糾葛等，必將成為文學創寫之緣由，甚且是重要的表現主題；而與他族之關聯等，或有不同程度的文化衝突。就常理而言，這會是東南亞華文文學的一大特色。

進一步說，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等，與所在國的關聯更密，而父祖的原鄉日遠，終將成為不可企及的文化鄉愁。但不管如何，能用華文記錄生活、書寫感受者，其養成教育必有相關文獻典籍的閱讀；一九

七〇年代中後期開始，資訊日暢、交通也日漸便捷，重返故園或旅行大江南北的經驗，都將使華族文化成分和他們的生活及寫作相互結合，這也會是東南亞華文文學的一個特色。

再來，由於華人南來是進入別人的國家，所在國的政權一般都在他族手上，常有不同程度的排華現象，華人必須自力救濟、自謀發展，因此而形成的華團（血緣、地緣、業緣），所推行的華文教育，所創辦經營的華文傳媒，三者即構成人文環境，提供華文文學的生成發展。這種文藝生態也是東南亞華文文學的一個特色。從這裡也特別容易看出各國華人社會及華文文學的差異。

最後，就整個東南亞來看，各國皆有被殖民的歷史階段，所以被殖民與後殖民的經驗已內化成為文學的血肉；一九四〇年代初期幾全淪陷於日軍的鐵蹄之下，更是東南亞華人的共有經驗，故文學史皆有所謂黑暗期和戰後不同狀況的文藝復興。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結束，中共建政，國府遷台，東南亞華人之依違擺盪於兩岸之間的情況到處都是，華社的左右對立在文學界也非常明顯，這也算是東南亞華文文學共同的特色吧。

三、我在東南亞華文文學領域之探索

一九七〇年代後期，我大量閱讀當時所見的諸多中文現代小說，特別是主流媒體上的作品，在那種情況下我讀到了李永平的《拉子婦》，被其中華人和當地原住民的衝突所震撼，被那圍城的母親之苦難與偉大所感動，三、四年後乃寫成〈重讀《拉子婦》〉，表達我閱讀之感受。這時候，我尚無「海外」或「世界」華文文學的意識；甚至於讀商晚筠《癡女阿蓮》而興奮異常，於其中之異域色彩與種族糾葛，頗有一探究竟的興趣。然而或因背景之欠缺了解，或因小說經驗還很不足，我並未形成閱讀大馬留台生文學的問題意識，因此並沒有展開所謂的「研究」。

我對星馬華文文學比較全面的了解是受了著名作家柏楊的影響，那是在一九八〇年代的初期，他找我協助他編輯《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為此我乃盡可能閱讀與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有關的資料，以作為文學的外緣理解。最後編成一套五本的大書，除小說外，其他四類（詩歌、散文、雜文、文學史料）由我負責，並撰寫「導言」。

編輯工作帶動我的文學知識領域之開拓，其後的發展大類如此，我從一九八〇年以後，在學院和大傳媒兩棲作戰，前者由專校、私立大學到國立大學，後者則遊走於出版社、報社和雜誌社之間，場域雖不同，但一以文學為工作及關切對象，而在文學領域，我由古典而現代，由中國而台灣，再以台灣為中心及於現當代大陸以及和兩岸息息相關的港澳、東南亞。

多少年來，我主要通過（1）媒體的編輯企畫和執行、（2）主辦和參與學術活動、（3）國科會的專題研究計畫等多管道，接觸和探討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的華文文學，累積了大量的相關資料，也寫出了不少長長短短的文章，有學術論文，也有書評、序跋等兼容理性和感性的篇章，我簡單歸類如下：

【通論】

- 1、東南亞華文文學在台灣（1991）
- 2、關於「東南亞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1991）
- 3、20世紀中文文學的空間分布（1996）
- 4、「世界華文文學」（1999）
- 5、文藝生態與東南亞華文文學（2003）
- 6、「東南亞華文文學」課程大綱（2003）
- 7、「世界華文文學新世界研討會」論文集編後記（2003）

【新加坡】

- 1、《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導言（1982）
- 2、入乎其內，出乎其外—論王潤華早期的詩（1988）
- 3、歷史與現實的交會—蔡深江詩集《如果不能回頭就忘記月光》（1990）
- 4、張曦娜《答客問》序（1994）
- 5、新加坡五月詩社的發展歷程（1997）
- 6、一冊詩集的愛與美—序新加坡詩人文愷的《廢井傳奇》（1999）

【馬來西亞】

- 1、重讀《拉子婦》（1980）
- 2、商晚筠《七色花水》序（1991）
- 3、筠之晚矣，綠轉黃—遙祭大馬小說家商晚筠（1995）
- 4、狂歡的盛宴—馬華散文七字輩出現文壇（1996）
- 5、馬華詩壇七字輩（1997）
- 6、商晚筠未結集作品略述（1997）
- 7、歌在黃金之邦—馬華詩人傳承得（1997）
- 8、重返大馬的策略—《馬華當代散文選》評介（1999）
- 9、詩巫當代華文新詩—以草葉七集為主要考察對象（2000）
- 10、抓住歷史轉折的關鍵—黑岩小說集《荒山月冷》的一些考察（2000）
- 11、以詩巫為中心—砂華小說家黑岩的近作考察（2002）
- 12、砂華華文學散記（2004）
- 13、因情立體，即體成勢—溫任平《戴帽子思想》序（2005）
- 14、「犀鳥之鄉—砂拉越華文文學」前言（2005）

【菲律賓】

- 1、寫在「菲律賓華文文學特輯」之前（1986）
- 2、空山秋菊—隔海遙祭陳天懷先生（1988）
- 3、菲華新詩的一些考察（1991）
- 4、菲華現代新詩中的華人處境（1994）
- 5、菲華散文的文化屬性—以選集為考察對象（1997）
- 6、菲華新詩的海洋意象（1997）
- 7、我在菲華文學領域的探索（1997）
- 8、裁章織句自忘憂—想念莊無我先生（2002）
- 9、現實的深度和廣度如何計算—《王勇詩選》（1983—1996）序（2004）

【附錄】

- 1、寫在「香港文學特輯」之前（1985）
- 2、八〇年代香港的新詩界—以文學刊物為中心的討論（1988）
- 3、不遷的人—盧瑋鑾《今夜星光燦爛》序（1990）
- 4、論溫健騮離港赴美前的詩—以《苦綠集》為探討對象（1999）
- 5、在香港想「香港文學」（1999）

四、南方的誘惑

一九九八年我在台灣《聯合報》寫「文壇行走」專欄，曾撰〈南方的誘惑〉一文，說明我逐步探索東南亞華文文學的過程，其中有這樣的文字：「從此，南海更南之南洋群島乃成了我經常關心注意的地方，南方於我成了一種誘惑」；「當年，我隨柏楊而南行；多少年後，我猶在南方那千島之間獨自航行」。

近幾年，我在國科會的贊助下，在砂拉越拉讓江畔的詩巫進行華文文學的實地調查，也想擴大做整個砂華文學的研究，雖然陸續累積了不少資料，但進度始終不快。看來非加緊腳步不行了。也許我該把現有的成果匯編起來，出版後再來思考進一步的研究走向。

〔附錄〕南方的誘惑／李瑞騰

暑假間找了兩個學生協助我清理柏楊研究資料，我自己也努力清理我所認識的柏楊。在一堆泛黃的照片中，我找到一張二十幾年前在華岡史紫忱老師府上初識柏楊那天拍的照片，那時柏老剛從綠島歸來，染過的黑髮，似乎不易看出他曾受過的苦難和歲月的滄桑，而我猶是瘦弱的研究生。

八〇年代初，柏楊找過我協助他做兩件事，一是幫忙《一九八〇年中華民國文學年鑑》的概述撰稿，一是編輯《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關於前者，去年我在《一九九六台灣文學年鑑》出版時，曾在本報「讀書人」版撰文提到柏楊的「年鑑夢」於我的影響；關於後者，柏楊開啟我的另一扇文學窗，展開了我在東南亞華文文學上漫長的探索旅程。

關於編輯那套新華選集的事，是一個複雜而艱辛的過程，我得大量閱讀從新加坡組好寄來的稿件，編選並撰寫導言。該選集五巨冊，有四冊(詩歌、散文、雜文、文學史料)的導言由我執筆，最後決定不署名，唯獨詩歌那一冊在目錄上竟不小心留下了我的名字，一九八八年我在新加坡參加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會議，在接受《聯合早報》資深記者吳啟基(詩人吳垠)訪問時，我談到編輯的狀況，訪問稿刊出，一些海外的朋友才知道我實際編輯了那套書。為了做好編輯工作，我惡補有關新加坡史地知識，接觸新加坡就等於碰了馬來西亞，其後我編商工日報副刊、文訊月刊，視野乃擴大至菲律賓等地，在副刊製作菲華詩展，在月刊，做菲華文學特輯、東南亞華文文學專題等，從此，南海更南之南洋群島乃成了我經常關心注意的地方，南方於我成了一種誘惑。

我盡可能蒐輯有關東南亞華人的資料，文學部分更是重點，有機會就去，開始寫一篇又一篇的論文。去年十二月初，我應邀到砂越的詩巫(Sibu)演講，帶回來的書就大約有五十冊之多。

利用整理柏楊資料的空檔，我找出了一個資料夾，裡頭全是我自己寫的關於東南亞華文文學的長短文章，看著每一個篇章，伏案之際的情景皆一一浮現，當初之所以辛勤筆耕，以及和論述對象之間的關係，甚至於發表時的反應等等，也都記起來了，兩度菲律賓，五、六回星馬的學術之旅，在各地訪友、訪書，參加活動的足跡所至，乃鋪成極其豐富的專屬我個人的東南亞研究史。

我有點想出版這樣的一本書了，用心的編了一個目錄，敬謹寫下一個書名《南方的誘惑》。是出書的時候了嗎？不是還有數篇想寫而未寫的題目嗎？在台灣出這樣一本書的意義何在？有益世道人心嗎？出版了以後，我還會繼續這孤寂的旅程嗎？問題都不難回答，也可以沒有答案。我想起柏楊最近提到他的未竟之願：編完新加坡，要編馬來西亞！但多少年過去了，馬華一直沒編。我告訴他馬華正在編大系，

新加坡有一組人正在全面編東南亞，我們還需要做這樣的事嗎？柏楊說，在台灣做不一樣，但「這事應由你來做」。

不管出或不出，編或不編，南方仍然誘惑著我，我念著想再去一趟婆羅洲，古晉、美里、詩巫，甚至於沙巴，想去馬尼拉再看一眼巴石河，到檳城拜訪光華日報熱情的友人。

當年，我隨柏楊而南行；多少年後，我猶在南方那千島之間獨自航行。

文藝生態與東南亞華文文學

李瑞騰

傅先生，唐教授，吳博士，王院長，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早安！

要在這麼重要，而且對我來說非常具有意義的一個研討會上，把我多年來在東南亞華文文學場域裏的相關心得向各位報告，我心裏有一些激動，也感到非常高興、榮幸。我回想剛剛吳耀宗博士提到的，1988年由新加坡作家協會跟歌德學院聯合主辦的東南亞華文文學國際會議，對我來說，那次會議打開了一個非常寬闊的文學視野，讓我認識了來自於東南亞各地以及大陸，甚至於在歐美的很多學者，對我爾後的學術生命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此外，我又特別想到1980年代的初期，我協助柏楊先生編輯一套非常特別的《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³，那是一種驚豔的過程，我到今天都難以忘懷！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南方的誘惑〉⁴，敘述我在東南亞華文文學領域的探求。我自己常常覺得，「南方」對我來說，彷彿是永遠在召喚我的一種聲音，縱使再怎麼忙碌，甚至於說根本找不到堅強的理由，只要有來自南方的約請，即使要自己花錢，我都會來。我不知道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原因，1988年那場研討會，到今天10幾年過去了，我還是非常懷念。剛剛吳耀宗博士特別提到在99年有一場研討會，討論「人與自然」的環境文學課題。那一次，我很遺憾沒有躬逢其盛，但是今天我來了，而且大會特別希望我在這個地方把我自己的心得向各位報告，大家應該可以理解我現在的心情。

這次大會的主題——「當代文學與人文生態」，關於「人文生態」這個辭彙所代表的意義，對我來說，其實也就是我多少年來，不管是面對臺灣的文學，或者面對東南亞的華文文學所一直想要去瞭解的。它其實是指一種環境，一種人文的環境，它到底能給文學發展什麼樣的助力，或者是什麼樣的阻力？「生態」兩個字，來自「自然生態」，是「生態學」的一個概念，討論的就是生物及其周遭的生物以及那個環境之間的關係，易言之，是從個體的生物，到族群，到一個聚落，到整個生態系統，有一個複雜而微妙的發展過程。

各位瞭解，自然界有其複雜性與互動性，以海洋生態來說，昨天搭飛機快到新加坡的時候，潤華先生指著機場跟我說，那是填海而成的。這是典型的人跟自然在爭生存空間的例子。但是，當人爭贏的時候，自然的某一部分改變了，連帶著人也會產生變化。這種變化性，當我們極力要開發經濟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是不會考慮到的，但是，當經濟開發到相當程度時，你就不能不考慮，否則的話，我們很可能會一起毀滅。各位都知道，臺灣前幾年有一場很大的地震，就是所謂的「九二一」，在那個地震之前，我從來沒有聽說一個名詞叫「土石流」，山會走山，聽都沒聽過，但是現在，每一次下大雨，那個山上的河流，不是真的水啊，是沙石湍急成河。這種現象，是標準的大自然向人類反撲。上一次研討會，處理的就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反應在文學上的複雜課題，但我們今天處理的是人文生態與文學關聯的部分，不是生態文學，而是文學生態，拉高層次就是文藝生態、人文生態。

³ 柏楊主編的《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一套五冊（台北，時報，1982），分詩歌、散文、雜文、小說、史料五卷，我個人參與了編輯工作，除小說由已故詩人周安托（筆名歐周，1944-1999）負責以外，四卷都由我執行，並為各卷寫下導言。

⁴ 見台灣《聯合報》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日「文壇行走」專欄。此外我個人曾撰〈我在菲華文學領域的探索〉一文，文載台灣《文訊》雜誌一四二期（1997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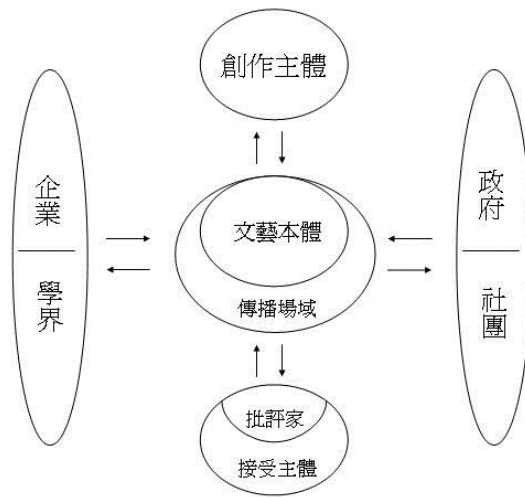
它到底能不能成為一門學問，叫做「文藝生態學」。而實際上，大陸已經有一個學者，寫了一本《人文生態學引論》⁵，談的是人、文學的、綠色的一種思維。綠色是大地，是生命的本色，是我們所追求的一種純淨的、合乎我們生態的一種顏色。過去我買到這本書的時候，一直不注意它，因為把書一翻開，第一章叫做馬克思主義文藝生態。各位都知道，我們在臺灣長大的人，對姓馬的人，心情都很複雜。過去我們看到馬克思這三個字會發抖，現在我們看到姓馬的人可能會很喜歡，因為臺北市有個馬英九。這也是一個人文生態的變化。《文藝生態學》這本書，對我這次在準備這個課題幫助很大。最近我的學校有一個博士班的研究生剛寫完博士論文，三四十萬字，很大的一部書，叫《臺灣自然寫作研究》⁶，這個同學在寫作的過程中，用了很多包括土地倫理、環境社會學的相關資料，我因為要口考這篇論文，也花了很多時間讀相關的東西。另外還有一個機緣對這個題目產生很大的興趣，我的大兒子今年上大學，去讀社會福利系。社會福利基本上就是社會工作，是社會學的一種應用。為了要幫助他儘快進入這個環境，我自己就到書店、到圖書館去看各種不同的社會學的書，有很多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包括了文學社會學、環境社會學等。我突然發現，這些各種不同的社會學學科，以及我剛剛跟各位提到的有關於生態的一些書籍，它們所處理的課題到最後可以說是萬流歸宗，都與人所生存的環境有關。

我今天在這個地方想把「文藝生態」跟「東南亞華文文學」做一種結合，我知道這難度很高，生態學又不是我的專業，對東南亞華文文學我比較感興趣而且接觸比較多的只有新加坡、馬來西亞，還有菲律賓，其他的地方，比如泰國、越南、印尼等地的華文文學，我並沒有深入的了解，所以談這個問題，並不能全面。但是我想到，文學的問題，最根源的地方還是創作者。創作者通過他自己的生命跟外在環境之間互動，然後以他自己所能掌握的文學形式把它表現出來。表現出來以後，必須通過很多種傳媒去跟他所要訴求的對象，那些社會上不確定的多數（也就是所謂的讀者，或者叫做接受者）去接觸。他在寫作的過程當中，受到很多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這其中有自然的因素，有人文的因素。當作品寫完了以後，它變成社會上一個流動的產品。這中間如果沒有傳媒，原來的文藝需求，或者社會的功能，基本上是沒辦法發揮的。在這整個複雜的體系當中，我剛剛提到的那本書裏面有一個叫做「文藝生態系統」的圖表⁷，我把它略作修改成這個樣子：

⁵ 本書為任教於成都大學的曾永成先生所著，書名叫「文藝的綠色之思」，「文藝生態學引論」是副題，2000年5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⁶ 作者吳明益是一位年輕的小說家及自然寫作者，前者有《本日公休》、《虎爺》，後者有《迷蝶誌》，台灣中央大學中文系博士，已應聘花蓮東華大學中文系。

⁷ 《文藝的綠色之思》頁150。原表中「政府」稱「管理主體」，「企業」稱「投資主體」，「批評家」稱「批評主體」，表示彼此關係的實、虛線極複雜，略作簡化，主體位置亦有所更動。



這個文藝生態系統，有一個創作主體，而在這樣一個大結構裏面的核心地帶，就是文藝本體，它包括文藝的表現（創作文本和文藝性活動等），以及中間這個傳播媒介，傳播者、接受者、批評家都有其主體性。作為最重要的政府，或者其他的社團，另外有企業，都和文藝本體產生聯動，也都自有主體。都存在於生態環境裏面。每一個主體都是非常複雜的構成，產生了一個有機的運作，到最後總的回歸到這個文藝表現上面。像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基本上就是一種文藝表現。那麼，這種文藝表現的質與量，我們怎麼樣去檢驗它？我們怎麼樣把它擺在一個脈絡裏面去給它定位？這樣的一種表現對於文藝的創作，對於我們講的生態系統，那種世界性的華文文學生態圈，就像我們研討會鎖定在東南亞，但是東南亞是一個大的文藝生態圈，一個大的文藝生態系統，對於各子系統，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值得我們觀察。

從主辦單位來看，新加坡國大藝術中心是一個很重要的教研單位，新加坡作家協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藝團體，還有其他贊助單位，政府的因素進來，民間有經濟能力的人的因素進來，之後才能夠集中在文藝表現上面。但我們要知道，當政府決定要給你某些經濟贊助的時候，那筆錢原來很可能是要給另外的活動的。這之間就形成了一個抵消的作用。它不可能增加，政府的預算就是這個樣子。你今天爭取到了，別人可能就爭取不到。這樣的支援就是資源，各位都知道，在自然界中，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呢？牠就吃泥沙，就是這麼一種互動的狀態，非常複雜。你不知道你今天用的錢，原來是用在哪裡？它很可能是擠出來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你壓制到一個東西，而內容你不知道。所以這些因素，都非常重要。它們彼此聯動，如果用生態學的話來說，就是所謂「生態關聯」。這種生態關聯太重要了，在每一個因素跟文藝表現之間的關係，我們原來可以進行分析，但是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好好的討論。下面我想把這樣一種結構，這樣的一種生態系統放在東南亞華文文學領域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把每一個因素擺進東南亞各地的華文文學情況去思考，政府對待華人的態度，對待華文的態度，對待華文文學的態度，都相當程度地制約、影響到這個地區華文文學的發展。我想這個道理很簡單。東南亞各國的政府或者執政黨，有哪個會對華文文藝提供經濟的協助？用我們的話來說就叫「文藝資源」。新加坡政府提供了這一個活動某些贊助，如果在馬來西亞，戴小華女士能向政府爭取到足夠使活動順利展開的資源嗎？也許她必須以她個人的魅力、能力去向民間的企業爭取。各位都知道，企業家裏面有一些有很深厚人文素養的人，也有很多人在寫作。企業家對於文藝的支援，有時候也並非純是文藝理由，有時候是私人的關係，有時候也是不得已的。譬如說，臺灣有許多企業家成立基金會，把協助文藝採取

一種機制來運作，它是可以減稅的。所以政府在這個部分它就必須建立一套制度，把企業家的資金轉移到文藝的活動上面。文藝的活動，當社會可以提供它成本的時候，譬如說通俗文學、大眾文藝，社會可以提供發展的空間，就不必管它，讓自由經濟市場去解決吧。但如果是一個前衛藝術，是一個小眾的、學術性的、嚴肅性的活動，政府在進行資源分配的過程中，必須把一些力量轉移運用在這些少數的或者弱勢的文藝表現上面，才能夠達到所謂的文藝生態均衡。但我們發現，某些地方不能提供文藝資源，文藝生態失衡，當然就萎縮了，譬如說，我們能夠期待印尼的政府來幫助華文發展嗎？這是不可能的，從上個世紀末起，印尼華文終於可以不必受到強迫性的壓抑了，這個壓抑一解除，華文就開始要長出來了，所以開始有一些公開性的文藝活動了。所以政府在這個地方應該扮演一個支援的角色，當政府沒有辦法扮演這個角色的時候，各位看看馬來西亞，華團對於文學作了什麼事？出版叢書，舉辦座談會、研討會，更重要的是，很可能各種不同的大系就這樣出來了。所以我們在每個地方都要調查，開發文藝資源，文藝的創作主體，或者說表現主體，就應該有能力去把這個資源開發出來，讓我們的文藝可以自由自在的發展。更進一步可以回饋到整個社會環境上。

這裏面相關的問題非常多，包括華文報刊。我們發現，馬來西亞的報紙，最近幾年也曾經出現過一些狀況，有一些爭論。但是，不管怎麼樣，《南洋商報》可以編年度的文學選集，《星洲日報》可以辦「花蹤」文學獎，配合當地的華語文學教育，在馬華文學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在座有很多來自馬華文學界的朋友，我一直覺得，馬華的文學在整個東南亞，以目前的情況看來，是最優質的。甚至於很多作家的作品，擺在現階段全世界華文文學的場域裏面，都非常優秀。有一些年輕的學生到臺北去讀大學，各位知道，大一之前他就是讀獨中的。我覺得，馬來西亞的獨中教育，對於馬華文學的發展來說，非常重要，現在研究獨中教育的相關論述不少，但是獨中教育對於馬華文學的發展到底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值得探討。各位想一想，泰國的華文教育，連台商的學校都有，但它有沒有高等學府？新加坡國立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國大有中文系，南大有一個中華語言文化中心，這兩個機構，對於文化界、文學界所產生的影響很大。各位知道，一大群人在從事寫作，背後那個支撐的力量，很大一部分來自於能夠從事批評、從事研究的那些學者。新加坡的華文文學以及華文文學的研究背後有一股學術的力量。各位如果去比較一下，新加坡國大，我們看到，王潤華教授，他本身是個詩人，也寫散文，他做專業性的學術研究，也可以做大眾文藝批評。吳耀宗博士也一樣，他們在學院裏面把手伸出去跟文壇握手，給予力量。這個力量，各位想一想，在馬來亞大學裏面，中文系的教授有哪一些人做到這個地步？有年輕的潘碧華、孫彥莊，但她們很年輕，可能還沒有辦法掌握實際權力。（今天王潤華博士對文壇的影響力，有一部分來自於他的行政權力，這個我們絕對不能夠否認。）但是，再看菲律賓，菲律賓華文的最高學府是什麼？可能是中正學院了。它有沒有我們今天講的文學的學術研究？批評家或研究者所扮演的角色有時候真的很重要，我們都知道，黃孟文教授從事寫作很久，在臺灣有一個年輕的研究生寫了一本黃孟文的研究⁸。黃教授不一定會直接跟這個人產生什麼樣的關聯，但是，他聽到這個訊息，想必會得到很大的鼓舞。文人創作其實不一定是想要創造什麼利潤去買房子、環遊世界，常常就是心裏的那種感覺。各位，幸福不也只是一種感覺嗎？那種感覺可以轉化成為前進的力量。所以外在的環境對於文學的發展影響真的很大，過去長期以來，我們討論文學史，討論文學批評，都只針對創作文本，我覺得在現在，或者在未來，應該有比較大的突破，我們應盡可能把文學的相關問題擺進文藝生態系統去討論。

我們進一步回到文學的創作主體來看，作家結集成為社團的這件事情，作家的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的問題，各位想一想，我們常常講「以文會友」，這裏也是以文會友的場所，以文會友的真正意義是彼此在寫作上可以互相切磋，真正的交流對話。「對話」如果能夠真正去實踐的話，彼此可以互為主體：他得到，我也得到，互為主體也互惠。文人彼此之間，這個社群跟那個社群之間就應該如此。最近潤華

⁸ 《新加坡華文作家黃孟文作品研究》，葉玉慧著，台灣淡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0，何金蘭教授指導。

先生到臺灣去，行政工作繁重，楊松年教授也到臺灣去了。當他們兩個先後離開新加坡的時候，我心裏面有一種感覺，那就是，新加坡華文文學研究這塊領域裏面會不會產生變化？但是，我們到了這個現場，我們看到，今天這個會議發表很多論文，有很多人來參與，我們一看，它產生了變化，對我們來說這一點可能滿重要的。潤華先生離開了等於沒有離開，他隨時會回來；楊松年教授可能比較抽離，因為他的個性，他現在到了佛光山，那個地方，很好修行的地方，他的心境開始會產生比較淡然的轉變。這個轉變可能會影響到他對社會、公共領域事物的投入，他這個個體的變化跟他者之間也在互動。但是，這個社會有一種自然的調解機能，我們看到這個會議在年輕的吳耀宗博士全力的促成底下今天如期召開，我們看到許福吉教授參與了其中，當然，還有很多國大的朋友，還有很多作協的朋友一起共同來幫助。所以文人的社群，這個所謂文人圈，在文學社會學裏面一直是探討的核心地帶。它們之間會彼此消長，會彼此互相……，有些時候，我們可以這樣講，彼此消費、彼此創造。當然還會出現一種機制來幫忙調節或者復原。這是一個生態現象，而這種生態現象我們也在另外的地方看到不一樣的情況，譬如說，我們看到印尼，目前華文文學有復蘇的趨向，但是，它會形成一個什麼樣的景觀？我們可能需要久一點的時間去觀察。我們看菲律賓，菲律賓華文文學的社群很多，非常多，那麼，這些社群與社群之間，跟外在環境間會有什麼樣的互動關係？各位想一想，我們《聯合早報》、《聯合晚報》，馬來西亞的《南洋商報》跟《星洲日報》，它的版面，就是生產的工具。它這個版面，是要賣廣告的，是要賣錢的，它是要放在報社經營的大結構下去看待的。裏面的文學編輯非常重要，他是一個中介，一個守門人，是文學表現場域裏面的關鍵人物。批評家跟文藝編輯在這個社會上，絕對是站在關鍵性的角色。但是，菲律賓華文社群怎麼樣去表現它自己的文藝，它的刊物在哪里？它的刊物在報紙上，那個報紙的版面是租借來用的，可能不必付租金，但是，你自己必須去經營它，然後把那個報紙買下來後，把那塊割下來後，變成自己的刊物。文藝生態的不同，對於當地的華文文學產生很大的影響。各種因素之間都在互動，我們剛剛講過的，在菲律賓，它背後沒有強大的學術力量來支持文壇繼續往前走的情況底下，就非常需要新加坡、馬來西亞，非常需要臺灣，非常需要中國大陸的學者，對他們提出可能的協助，而那些也應該擺進這樣的文藝生態裏面一起共同來研究。

由於學養和時間都有所不足，我今天只能簡單的把我對於文藝生態和東南亞華文文學的關係提出來供大家參考，其中可以繼續發展的地方非常多，我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進一步深化探討。我自己在華文文學領域的研究，最近幾年跑到砂拉越去做一些比較實際的調查，我在拉讓江盆地的一個叫詩巫（Sibu）的地方，進行實地調查。最近我可能繼續再做第二次工作，所以比較上有不同的感覺。今天現場也來了一個汶萊的朋友，南大的雲惟利教授編的《東南亞華文文學選集》⁹裏面的有一卷是「汶萊卷」，在來之前，我幾乎把它看完，非常感佩在那樣一個很不健全的文學生態中，有一批人願意組一個「寫作組」在那裏經營他們的文學，他們連一個報紙都沒有，都必須跟《美里日報》借用版面。我想這樣的一個情況，他們居然可以提出那麼一本很大的選集，讓我們更加覺得非常的珍貴。謝謝各位，謝謝。

⁹ 《東南亞華文文學選集·汶萊卷》，王昭英主編，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出版，二〇〇一。